

『制度人』假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Institutional Man" Assumption

From Plan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主 编 / 苏东斌
副主编 / 刘荣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F014.3

22

"Institutional Man" Assumption
From Plan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制度人"假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主 编/苏东斌
副主编/刘荣荣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制度人”假设：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苏东斌主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7

ISBN 978 - 7 - 80230 - 758 - 2

I. 制… II. 苏… III. 市场经济 - 经济制度 - 研究
IV. F01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99301 号

“制度人”假设

——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

主 编 / 苏东斌

副 主 编 / 刘荣荣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

邮政编码 / 100005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65269967

责任部门 / 财经与管理图书事业部 (010) 65286768

电子信箱 / caijingbu@ssap.cn

项目负责 / 周 丽

责任编辑 / 李玉平 屠敏珠

责任校对 / 孙振远

责任印制 / 盖永东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65139961 65139963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市场部 (010) 65285539

排 版 / 北京鑫联必升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 × 1092 毫米 1/16 开

印 张 / 44.5

字 数 / 674 千字

版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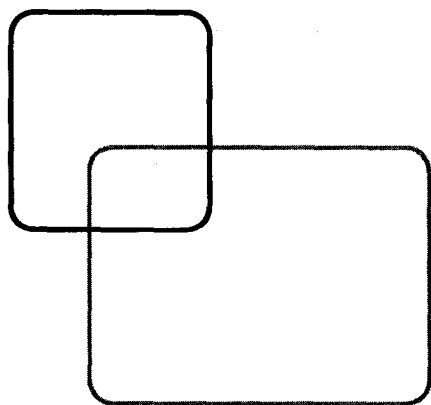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 - 7 - 80230 - 758 - 2/F · 163

定 价 / 8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市场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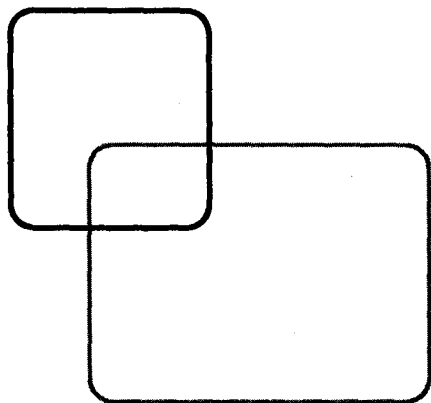
综论：大江东去	1
---------------	---

上 篇

第一章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实践历程	79
第一节 苏（俄）计划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	79
第二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全面建立	114
第三节 苏联计划经济制度的一般性变革	138
第二章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	157
第一节 毛泽东的经济思想	157
第二节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的基础——公有制经济	171
第三节 中国计划经济制度的运行	187
第三章 计划经济制度的一般特征	227
第一节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计划经济构想	227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计划经济思想	257
第三节 计划经济制度的实质	285

下 篇

第四章 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演进历程	327
第一节 邓小平的经济思想	327
第二节 中国所有制结构的市场化变革	336
第三节 中国市场经济制度的运行状态	382
第四节 中国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439
第五节 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基石	489
第五章 苏（俄）、东欧的市场化革命	503
第一节 戈尔巴乔夫时代的改革	503
第二节 苏联解体后的市场化进程	522
第三节 东欧国家的市场化进程	546
第六章 市场经济制度的一般特征	579
第一节 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	579
第二节 “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机制	588
第三节 现代政府的经济行为	607
第四节 经济体制与社会正义	625
第七章 市场经济制度中的经济计划	650
第一节 法国的经济计划	651
第二节 日本的经济计划	667
第三节 美国的经济计划	677
第四节 市场经济中的计划与计划经济制度的本质差异	681
参考文献	685
后 记	703



CONTENTS

Foreword / 1

Part I

Chapter 1 History of the System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 79

Section 1 Initial Formation of the System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 79

Section 2 Full Establishment of the System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 114

Section 3 Non-fundamental Reform to the System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the Soviet Union / 138

Chapter 2 For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in China / 157

Section 1 Mao Zedong's Economic Thinking / 157

Section 2 Foundations of China's Planned Economy-State-owned Economy / 171

Section 3 Functioning of China's Planned Economy / 187

Chapter 3 Main Feature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 227

- Section 1 Planned Economy in the Minds of
Utopian Socialists / 227
- Section 2 Marxists' Doctrine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 257
- Section 3 Nature of the Planned Economy / 285

Part II

Chapter 4 Evolution of the Market System in China / 327

- Section 1 Deng Xiaoping's Economic Theories / 327
- Section 2 Market-oriented Reform of China's
Ownership Structure / 336
- Section 3 Operational State of the Market System / 382
- Section 4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 439
- Section 5 The Legal Footstone of the Market
System in China / 489

**Chapter 5 Market-oriented Revolution in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East Europe / 503**

- Chapter 1 Reform Initiation in the Mikhail
Gorbachev's Time / 503
- Chapter 2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after
the Soviet Union CollapsedX / 522
- Chapter 3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in East Europe / 546

Chapter 6 Features of the Market System / 579

- Section 1 Economic Man in the Market Economy / 579
- Section 2 Functioning of "Invisible Hand" / 588
- Section 3 Economic Behavior of Modern Governments / 607
- Section 4 Economic System and Social Justice / 625

Chapter 7 Economic Plans in the Market System / 650

Section 1 Economic Plans in France / 651

Section 2 Economic Plans in Japan / 667

Section 3 Economic Plans in America / 677

Section 4 Different Points Between Economic Plans in the Market
Economy and the Planned Economy / 681

Bibliography / 685

postscript / 703

综论：大江东去

显然，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的基本点是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理性；而经济学中的“制度人”假设的基本点则是：虽然制度最终还是由人来制定的，但人必须而且只能生活在特定的制度之中。这样，人们要想改变现状，只能首先去改变制度本身。这也就是制度的重要性及其对人的积极而不是消极的作用。

——题记

（一）

20 世纪 30 年代，在米塞斯发动的那场关于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的大论战之后，哈耶克进行了一次大反思：“这些如此引人入胜的经济计划，有无实现的可能？”经过艰苦卓绝的研究，这位孤独的先知，终于掀起了扭转时代思想的大潮流。他的最终结论是：由于人类理性的有限性，所以计划经济在经济效率上是不可行的；更主要的是由于它必然会剥夺自由，所以计划经济在道德上也是不可取的。这正是“只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

基于此，我们创造了这部史论。其目的还是为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提供理论上的支持。

在如何对待现代化的问题上，书中强调：

其一，早在1874年，清末有识之士，曾经担任清廷驻外使节的郭嵩焘就提出了他的疑惑：“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舍富强之本图，而怀欲速之心以责于海上，将造船制器，用其一旦之功，遂可转弱为强，其余皆可不问，恐无此理。”

而另一位薛福成在《四国出使记》中引证了新加坡、香港开辟商埠以来经济繁荣的事实之后，发表了一段十分精彩的议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开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叠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植，而植益胜；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盖在太古民物未繁，原可闭关独治，老死不相往来；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薛福成在这里为资本主义在中国鸣锣，要求让商人从“四民之殿”的地位上升到“握四民之纲”的地位，这确实是“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的新道理。

他更深刻地论述：“今之议者，或惊骇他人之强盛而推之过当；或以堂堂中国何至效法西人，意在摈绝而贬之过严；余以为，皆所见之不广也。”他说：西方的科学、文化、技术和经验，是人类文明的积累，“乃天地间公共之道，非西人所得而私也”。既然欧洲在历史上接受过东方文明的影响，“中国又何尝不可因之”？讳疾忌医和因噎废食都是不对的。他说：只要中国人善于学习、敢于竞争，“又安知数千年后，华人不因西人之学，再辟造化之灵机，俾西人色然而惊、欣然而企也”！^①

其二，1965年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的《激荡百年史》中更加精辟地分析了科学技术与制度因素的深层关系。他指出：外国文明的输入很容易破坏本土社会、文化和精神上的统一。在德川末期，一些思想家们曾预想用“西方的艺术、东方的道德”或者用“西方的学识、日本的精神”作

^① 钟叔河：《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第162～163页。

为对付这种破坏的公式。

显然，这样的公式与实行近代化是相背离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受倡导的文明原本是一个统一体，很难只单单采用它的科学文明技术。如果要采用西方先进的军舰和武器，就必须修建配套的造船厂和兵工厂，为了使造船厂和兵工厂的机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的发挥，就必然会让构成它基础的经济活动能够得到顺利进展。

过去的儒教伦理将追求利润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就产生了矛盾。因此，想要拥有军舰就必然会影响该国的文化。

然而，就算业已输入西方国家的科学文明技术，要吸纳其政治观点、思想方法等形成其文明基础的东西，仍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是这样一些所谓的价值体系，如果没有经过漫长的历史过程，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地创造它，那么，努力改革的东西就不能够成为人们一种真实的道德基础。

因此，在一种不得已的情况下，采用外国文明的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这种困境是深刻且令人进退维谷的。

在那个时代，有个学者曾经说：“孔孟的道德已经衰落了，西方的理论还未进入，这就像太阳已经落山，而月亮犹未升起时的情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驻日本的占领军，在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占领军。恰恰是美国占领军，不仅占据着胜利者的地位，而且还以改革者的身份在日本国土上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美国将二战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日本和德国的军国主义，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对日本进行改革，瓦解日本军国主义存在的社会结构，削弱日本的军事能力，才能构建世界和平。抱着这样的目的，他们在进驻日本之前就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当军队进驻日本后，就开始按照计划在日本推进非军事化和民主化。

美国的占领军在1945年8月末进驻日本后，就开始实施了以下的措施：在非军事化方面，首先在9月11日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数名主要战犯，接下来解除了日本军队的武装，废除了日本的军事机构，一些国家主义的团体也被解散（1946年1月）；在民主化方面，进一步整肃了一些不受欢迎的公职人员，思想警察和政治警察也被废除了（1945年10月），赋予妇女参政权（1945年12月），组织工会（1945年12月）等等。

在战后一两年之内占领军又采取了土地改革、教育改革、解散财阀和制定宪法等措施。这些巨大的变化简直可以称为“不流血的革命”。^①

这两段话所表达的是制度何等重要！但是，制度经济学一再提醒人们：不仅制度规则是由人来制定的，而制度执行更要依赖于人来完成。而作为经济人，又都是在追求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所以，任何意义上的人性假定，都离不开具体人的具体行为。

而在浸透着儒家礼仪和缺乏公民意识的国度里，是一个长期“以父为中心的家长家族制和宗法组织”的国家，用王亚南先生的话说，这种情况“在专制——官僚的政体实现以后更加强化了，但在这以前，却显然存在着这样一个可供官僚政治利用的传统。国与家是相通的，君权与父权是相互为用的。”^②“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在人们的意识深处两者是相提并论的。遵循这样的传统，国人对家庭的忠诚很自然地就转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在家庭生活中灌输的孝道和顺从，是培养一个人以后忠于统治者并顺从国家现政权的训练基地。”^③“皇权主义最深厚的根基，正是这种家长制。”^④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一旦放弃了对人权的尊重和对产权的保护，大多也就自己丧失了自主意识。于是从上层的人治社会到下层的无法无天，便使制度因素更加虚拟化了。

于是，我们评价历史，也就不能仅仅依据个人的主观动机，甚至也不能仅仅依据他的动机所实现的程度，而只能依据大多数人的基本实践结果。对于所谓的“好人好事”是如此，对于所谓的“坏人坏事”亦是如此。

正如苏联的改革，对政治人物来讲，是失败了。因为作为改革的领袖戈尔巴乔夫几乎丧失了个人所拥有的一切特权（无论别人如何分析，也无论戈尔巴乔夫本人如何解释，这一后果绝不是他本人所希望呈现的）；而对政治事件来讲，却是有另外的结论。因为它开启了苏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的伟大时代。若按着马克思主义经典

① [日] 吉田茂：《激荡百年的史》前言，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②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41页。

③ [美] 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22页。

④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130页。

作家的核心价值观念——自由——来判断，“无论如何，俄罗斯人民要比苏联时代获得的自由要多得多”（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俄罗斯的经济学家阿巴尔金教授语录）。而“这个结论恰恰仅仅来自于社会实践，来自于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语录）。

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才常说：作品的主题远远大于作家的思想。于是，如果我们再追问，人和制度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答案也便一目了然了，那就是，制度绝对是人制造的，而人又绝对不能随心所欲。

当我们赞同任何动物、生物、乃至物品的本质都是预先被设计好了的，而人却只能通过自我选择来创造自己的本质的时候；当我们确信人生不是别的，乃是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的过程，放弃了选择，也就是放弃了自由的时候；当我们承认“上帝死了”的时候，自己才有了称得上“人”的尊严感。可以说，作为哲学家、思想家的萨特，至今还在影响着我们。

当年，马克思主义者的佩里·安德森在研究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学说时，特别着重“历史可能性”的时刻。因为在人的行为面前，他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多么神圣或者多么为人所熟知的体制，都不是原则上不可触动的：“制度的格局比人们认为的要更柔弱和可塑一些”。这不禁使人记起波普尔的反历史决定论的坚定主张。因为他的全部出发点都是历史是人创造的，社会的发展不会如同物理世界那样，存在一种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既没有时代制约，又没有国情限制的一般规律性，而在这里，“昨天的异端的确会成为明天的信条”。

当然，人也绝不会永远专横而自负下去。因为正如洛克所说：“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秉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①

（二）

对于当初中国选择计划经济制度的动机问题，应当承认，毛泽东是极为真诚的。

^① 引自哈耶克：《致命的自负》第2章开头引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毛泽东在1956年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说过一段广为传诵的话，他说：“我们这个国家建设起来，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将完全改变过去一百多年落后的那样情况，被人家看不起的那种情况，倒霉的那种情况，而且会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就是美国。”他又说，“再有五六十年，在钢产量上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这是一种责任，历来自诩的地大、物博、人多，你有那么多的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①

我们可以从计划经济制度时代最典型的事例来看计划经济的本质。不是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而变成了“赶超”、“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主观意志。

从当时的国际背景来看，领袖们有些头脑发热。1957年11月初，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11月18日，他在有64个党的代表团所参加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12月2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第296页。

1958年4月15日，毛泽东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根据王鹤寿等同志报告中的观点，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在送出此文时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诸等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写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据回忆，5月18日，毛泽东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了李富春同志的意见，稍加变通，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6月22日，毛泽东对一个《汇报提要》做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两千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①

31日，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议做总结发言，传达了毛泽东一个惊人想法：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用不了一二十年，苏联可以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可以变为四个美国。到这时，使人感到，一般地赶超英美已不够气魄了，中国人民要有这个志气，美国不在话下，于是一个中国变成“四个美国”。而且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你赫鲁晓夫只不过变成两个美国，我比你多一倍，所以我是英、美、苏一起超过！^②

从当时的思想根源上看：是急于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题目叫《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18日晚，毛泽东在推敲经大会秘书处已经铅印好的发言稿时，在结尾的部分，新加了一段话，大意是：

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中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中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

① 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7页。

② 参见李锐：《“大跃进”亲历记》下卷，南方出版社，第29页。

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超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和其他教育事业，也将朝这个目标发展。

另据胡乔木回忆：1958年2、3月间，毛泽东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同年6月14日，刘少奇同全国妇联党组的谈话中说：“毛主席讲过两次，家庭是要消灭的。他提到康有为的《大同书》。”在中国，康有为最早提出消灭家庭。《大同书》中，主张男女同居不得超过一年，消灭了家庭就可消灭私有财产。毛泽东认为家庭不过是历史上产生的一段现象，在“大跃进”时，他多次有过消灭家庭的想法。

早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书中，毛泽东就提到了康有为，将他列入“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并且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现在，到了中国人民“大跃进”的年代，毛泽东自认为已找到了这条道路。在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时，他还讲过这样的话：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一些理想，我们要实行。各地大办人民公社时，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曾经把《大同书》和《哥达纲领批判》一起送给基层干部。

虽然在“大跃进”时期毛泽东也仍然讲过极为精彩的话，如在11月9日下午的会上，谈到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许多观点，他是赞同的。他认为，现在还是要利用这个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来作为一种有用的工具。在目前来讲，这是有用的，是不坏的。他说，我们的国家是商品很不发达的一个国家，现在又很快地进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同商品交换还要发展。同一天，他给中央、省、地、县四级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读两本书（另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说：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有一大堆混乱思想。他们在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候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待目前经济实践中某些具体问题，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就打了折扣了。这些话都是针对陈伯达说的。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再次讲道：现在我们有些人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

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中小生产者，我国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民所有，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无非是怕资本主义。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初期阶段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产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

但是，可以认为，这些话是在纠正“乱子”的意义上说的，即为了把那些过于“狂热”的气氛冷却下来，而不是从彻底总结反右以来“三面红旗”的经验教训，认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角度出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这些认识和看法的实际指导作用，也不能使它们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

毛泽东对实现产品调拨仍情有独钟，而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却仍加怀疑。他说，他们销售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国的钢铁、粮食、棉花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他又说：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与此同时，毛泽东虽然看到了保留工资制等的不可避免性，也讲到要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但仍然希望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用以实现社会的平等，改造人们的思想，他的理想仍是供给制。他说，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除，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解放后，不利用供给制的长处，改成工资制；那时让一步是必要的，但有缺点，接受了等级制，等级森严，闹级别，闹待遇。他说：这些也让步，就不对了。^①

至于计划经济的方法，据薄一波回顾说：20世纪50年代，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只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而计划经济的标志就是国家直接下达指令性指标。

^① 李锐：《毛泽东晚年的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第262~263页。